

编者按：2016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上海主持召开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座谈会，研究部署相关工作。来自东、中、西、东北地区11个省份或地级市政府负责人参加。大家认为，“放管服”改革推动政府职能重塑，释放出巨大红利，透明、便利、公平的整体创业环境正在普遍形成，对新动能成长、就业扩大、结构升级的重要支撑作用日益显现。

之前的5月9日，国务院曾召开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议，总结分析了本届政府成立三年来的行政体制改革进程，认为深化“放管服”改革是推进政府管理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战略举措，尽管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人民群众期盼还有很大差距，会议对进一步深化“放管服”的改革进行了部署，并提出要中央和地方上下联动，攻坚克难，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推进“放管服”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不断提高行政效能。

“放管服”体现了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理念，体现了政府自身建设的完整性，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工作的深化。“放”的核心是政府角色定位问题，是要重新界定政府、市场、社会边界和相互关系，难点是如何补缺位、纠错位、控越位，让政府归位问题，考验的是政府定力和推动改革的能力，目的是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管”的核心是政府管理转型问题，管理变革要适应经济社会新常态、科学技术新进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涉及管理体制、部门职责、政府层级、运行机制、技术平台、法制保障等方方面面，目的是建设现代政府。“服”的核心是在“放”与“管”的全面深刻变化基础上形成的治理理念、治理机制、治理体系，是治理能力现代化，“服”既是改革举措，也是改革目标，目的是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深化“放管服”改革是一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深刻变革，是构建现代政府治理体系的重要抓手。我们可以相信，各级政府会以“啃硬骨头”和“自我革命”的精神，以“三严三实”狠抓落实的作风，敢于涉险滩，敢于过深水區，不断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坚持问题导向，推出更加务实有效的举措，真抓实干，狠抓落地，将“放管服”改革做深、做透、做到位，不断推向深入。

本期推出“放管服”专题，供您决策时参考，其他栏目的文章祈盼引起您阅读的兴趣。

本期专题·深化“放管服”

- 02 李克强在沪主持召开深化“放管服”改革座谈会
- 03 上海葱油饼店新闻发生后，李克强第一时间作了批示
- 05 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工作的几点思考

政坛经纬

- 11 为何设立国家监察委，它有哪些监察手段

经济纵横

- 15 林毅夫、张维迎之论需要分胜负吗

领导艺术

- 16 领导干部要有“大情商”

人物春秋

- 17 苏东坡与王安石的“半山”之谈

历史深处

- 18 蒋介石也曾在美国大选中“押错宝”

悦读时光

- 封三 “你办事，我放心”的若干史实（四）

主 办：盐城市图书馆

刊头书法：臧 科

主 编：刘 进

责 编：周玉奇

地 址：盐城市城南新区府西路6号

邮 编：224005

电 话：0515-69971581 18961988622

邮 箱：75156450@qq.com

网 址：www.yctsg.cn

设计制作：盐城市圆融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李克强在沪主持召开 深化“放管服”改革座谈会

11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上海主持召开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座谈会，研究部署相关工作。来自东、中、西、东北地区11个省份或地级市政府负责人参加。

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和上海市长杨雄、浙江代省长车俊、四川省长尹力、湖北武汉市长万勇、广东江门市市长邓伟根等谈了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方面的探索和成效。河北省长张庆伟、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布小林、黑龙江省长陆昊、福建厦门代市长庄稼汉、宁夏银川市长白尚成、江苏宿迁市长王天琦也介绍交流了有关情况。大家认为，“放管服”改革推动政府职能重塑，释放出巨大红利，透明、便利、公平的整体创业环境正在普遍形成，对新动能成长、就业扩大、结构升级的重要支撑作用日益显现。李克强说，“放管服”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是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抓手，是促进双创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关键所在。针对目前改革中仍存在的不到位、不

配套、不衔接等问题，必须进一步转变理念，持之以恒进行政府自我革命，以壮士断腕精神把“放管服”改革向纵深推进，用政府自身一时的痛换来人民长远的利。

李克强指出，要围绕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继续加大放权力度。完善负面清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等制度，系统梳理经济建设和养老、教育、医疗等社会民生领域审批事项，提出整体改革意见，确保关联、相近类别审批事项“全链条”取消或下放，最大限度精简优化，协同配套，放宽市场准入，方便社会资本进入。探索在工程建设领域实行“多评合一”“联合验收”等新模式，推动解决程序繁、环节多、部门不衔接等问题。全面清理各种行业准入证、生产许可证和职业资格证书，持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多证合一”“证照分离”，切实解决企业“准入不准营”问题。

李克强说，放与管相辅相成，更有效的管就可以更多的放，管得好才能放得活。要围绕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推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方式明年全覆盖，实行相关部门联合监管，避免重复检查、增加企业负担。（下转第4页）

上海葱油饼店新闻发生后， 李克强第一时间作了批示



中新社刘震摄

在 16 位部委负责人和 11 位省份或地级市负责人参加的“大会”上，李克强总理念念不忘提到了两家“小食店”。

“前段时间，有家馄饨铺和一家葱油饼店影响很大。”11月21日在上海召开的深化“放管服”改革座谈会上，李克强说，“这两家小食店可能确实存在证照等问题，但我们基层政府部门也应更多百姓角度考虑一下，尽量寻求更多人的‘共赢’。”

说到这里，总理的语调变得语重心长：“监管也不一定是冷漠的，要多带一点对老百姓的感情。”

总理所说的这两家小食店，分别是开在上海弄堂里的“梦花街 19 号馄饨店”和“阿大葱油饼店”。去年 8 月以来，这两家曾经被媒体和食客“点赞”

的小食店，因为经营地点为居住房屋无法办理证照被先后关停，引发舆论热议。

在新闻发生的第一时间，李克强就批示有关部门，要“以小窥大”，进一步考虑如何通过简政



梦花街 19 号馄饨店。图片来源于网络



阿大葱油饼店。图片来源于网络

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破除制约社会生产力和就业创业的不合理束缚，以主动服务的精神激发市场活力。而11月21日在上海召开的座谈会上，总理再次通过两家小食店的故事“以小窥大”，点题下一阶段政府职能转变和深化“放管服”改革工作。

李克强明确表示，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政府职能的重大转变，也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核心问题。

“在国际形势复杂严峻、经济下行压力持续的情况下，以深化‘放管服’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这是中国经济巨大的潜力所在。”总

理说。

李克强表示，本届政府成立以来，大幅取消下放行政审批618项，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创新监管方式，着力优化政务服务，从而极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新动能加速成长、传统动能改造升级。

他要求各部门、各地方要进一步从全局出发，勇于自我革命，以更大力度、更加扎实的举措，继续把“放管服”改革向纵深推进。

而被总理一再提及的“梦花街19号馄饨铺”和“阿大葱油饼”两家小食店，正蕴含着他对政府职能转变和深化“放管服”改革的更高期待。

“这些小食店都是小本生意，属于草根创业，群众口碑好，也有创新发展的意愿和社会需求。”李克强说，“对这些业态的监管，怎么把握好分寸，既执行有关规定，又扶持善待创业者？这个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总理强调，我们所说转变政府职能，不仅要从过去以“审批”为主转向以“事中事后监管”为主，更要转向以“优化服务”为主。

“各级政府要以职能转变的‘靓丽转身’，换取人民群众的更大福利。”李克强说。

（2016-11-22 新京报特约记者储思琮）

（上接第2页）加快建立完善失信惩戒制度，增强随机抽查威慑力。利用先进信息技术提高监管效能。对快速发展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要本着鼓励创新的原则，探索适合其特点和发展要求的审慎监管方式，使市场包容有序、充满活力。

李克强指出，提升服务水平要在智能便捷、公平可及上下功夫。各级政府要争做服务企业和群众的“行家里手”，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加快建成互通共享的网上服务平台，凡与企业生产经营、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事项，尽可能网上办理。尤其要适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小微企业发展需要，努力在政策宣介、法律咨询、场地和

融资、用工与社保等领域提供更好服务，着力培育发展新动能。开展减证便民专项行动，各部门各地方要全面清理并取消涉及群众办事的各种奇葩证明，最大程度便利群众。

李克强说，“放管服”改革事关全局，利在长远。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继续大胆探索、对标先进、挖掘潜力，特别是要推广复制自贸区的改革经验，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杨晶、万钢参加会议。

（2016-11-23：东方早报（上海））

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工作的 几点思考

2016年5月9日，国务院召开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议，总结分析了本届政府成立三年来的行政体制改革进程，认为深化“放管服”改革是推进政府管理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战略举措，尽管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人民群众期盼还有很大差距，会议对进一步深化“放管服”的改革进行了部署，并提出要中央和地方上下联动，攻坚克难，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推进“放管服”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不断提高行政效能。毫无疑问，“放管服”改革进入深水区，如何深入推进并取得实效，实属不易，笔者结合学习李克强总理讲话精神和近几年的实践调研，谈一些思考。

一、对“放管服”改革理念的再认识

“放管服”体现了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理念，体现了政府自身建设的完整性，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工作的深化。“放”的核心是政府角色定位问题，是要重新界定政府、市场、社会边界和相互关系，难点是如何补缺位、纠错位、控越位，让政府归位问题，考验的是政府定力和推动改革的能力，目的是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管”

的核心是政府管理转型问题，管理变革要适应经济社会新常态、科学技术新进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涉及管理体制、部门职责、政府层级、运行机制、技术平台、法制保障等方面，目的是建设现代政府。“服”的核心是在“放”与“管”的全面深刻变化基础上形成的治理理念、治理机制、治理体系，是治理能力现代化，“服”既是改革举措，也是改革目标，目的是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新形势下，推进“放管服”改革也成为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抓手，是国家宏观调控的关键性工具，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手段，通过“放管服”营造公平便利的市场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并与“双创”和发展新经济紧密结合、互促共进，形成经济发展的持续内生动力，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和比较充分的就业。

二、对“放管服”改革进程的再认识

在强力推进行政改革过程中，各级政府改革政策供给太快、太多，感觉体系乱、概念多，有的还存在一些冲突，造成一些地方和部门思想认识乱，群众和企业对制度改革也缺乏基本预期。

首先，改革进程中附加功能“太多”。大的方面说，刚开始只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紧接着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再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构建新型国家治理体系，从“放”“管”两个轮子都要圆到“放管服”三管齐下再到“放管服转效”五位一体；小的方面讲，以清单制度为例，刚开始还纠结于是审批权力清单还是所有行政权力清单，接着又引入了责任清单概念，再就是开始探索负面清单，有的地方提出了监管清单、服务清单、资格认定清单和财政支出清单等等。从中不难看出政府改革力求改变过去重权力轻责任，重发展轻民生，重企业轻民众，重生产轻生活等价值导向和功能追求。其次，改革政策供给“太快”。不少改革推进机构完成任务般地出台了大量政策文件。部门和地方应接不暇，前一波没落实，后一波又来了，来不及研究消化，改一改文字就进行了转发。不少市县也没深入研究，没拿出务实落地举措，一些地方取消了不知道，下放了接不住，接下了没优化，继续卡、繁、难。经常可以感到地方政府部门改与法难抉、利与义难全、放管间犹豫、线上下徘徊的情绪和心理。再次，现实情况“太乱”。有的地方三证合一，一证三号在试点，有的地方已经开始三证合一、一证一码改革，有的甚至在进行五证合一的探索。比如2015年到2016年发布的关于监管改革的系列文件，理念也先进，方法也可行，但由于体制、法制和运行机制惯性，落地还缺乏相关配套举措，探索改革的部门在上下沟通和左右协调方面遇到很多障碍，再比如大数据监管中的信息共享问题，综合执法中的上下对接问题，证件清理中的相关法律条款和文件要求取消问题等等。

三、对“放管服”改革推进机制的再认识

推进政府改革是社会系统工程，不是简单的部门政策文件的物理相加，而是要各种制度产生化学反应。实践中，一些政策制度“最先一公里”就存在很多不合理内容，不少已经通过法规政策固化，比如注册资本实缴制改为认缴制就涉及几

十部法律，相关管理制度变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政府管理实际运转中很多要求和举措多以方便部门自我管理为出发点，较少从民众视角设计流程和制度，政府工作人员改变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也很难，不设前置审批就不知该如何监管，总担心出问题承担责任；触动部门权力利益也太难，实践调查证明，含金量高的事项“群众点菜”十之八九由于各种原因难以启动，“地方点菜”的下放事项能落实的也不到三成，改革靠部门推进不可想象。现实改革中地方政府缺系统谋划，缺改革专门人才，存在不系统、不协同、不深入、不落地等现象。首先是谋划不系统。是否立足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制定一揽子改革举措，不少地方缺乏谋划，比如浙江推出的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天津开展的十个“一”改革，江苏简政放权“517”改革等就具有借鉴作用。其次是部门不协同。政策法规、权力下放、联合监管、信息共享、中介组织、诚信体系建设等方面都存在着中梗阻问题。再次是改革不深入。比如一些地方在制定责任清单时，竟然没有执法部门监督检查职责的内容。最后是政策不落地。事前指导和行政服务跟不上，群众获得感不足，与老百姓相关的政务服务中心的功能和定位在一些地方还不明确，民生、社会领域的改革力度有待加强，大家寄予厚望的互联网+思维，概念多过操作，系统开发不少，功用发挥不足。因此，改革推进机制必须进行整体谋划，合理布局，策略推进。

四、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要深入思考的几个问题

（一）渐进式改革是否遇到瓶颈

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渐进式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现在的问题是改革进入深水期，渐进式改革是否也遇到瓶颈和制约，在某些领域或某些环节是否可以采取激进式变革方式，很多试点地区和自贸区的改革实践经验，可否快速全面铺开。十多年来，理论界和实践部门都充分意识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四待”问

题需要突破。一是行政审批体制待突破。在这方面是否构建一窗式服务,是否强力推进两集中两到位,是否组建行政审批局等,已有的成功经验很多了,是否该明确方向了;二是监管权责体系待健全。部门间监管职能交错、边界不清、事中事后协同监管难,信息不共享、标准不统一,大数据监管难,一个市或县综合执法局机构进行了整合,上下左右沟通协调都挺难的,是否也可以明确下一步改革举措了;三是政务服务流程待优化。是否构建统一的基于民众办事的线上线下咨询、办理、取件平台,部门间政策法规协同清理修改和并联审核管理等问题也需要解决;四是审批信息系统待整合。几乎所有的审批、监管和服务事项的办理都要通过一定的信息化系统,现实情况是这些系统各自为政,国家层面是十二“金”工程,烟囱林立,很多系统一插到底,系统间共享兼容的主观意愿和技术标准都存在很多问题,即便同一部门,不同业务单元信息也不能共享。笔者曾在一个部门一张办公桌前看到四台电脑,据说根据不同情况要分别启动十多个办理系统。如何推进这些系统整合融通,不仅是技术问题,更要突破部门利益和行为习惯进行顶层谋划,是更大层面的治理决策问题。

(二) 碎片化改革如何走向整体推进

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着政府管理“碎片化”、公共资源运作“碎片化”、行政组织结构“碎片化”、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等状况,让人民群众办事费尽周折。在改革进程中,改革推进机构立足全局,以问题为导向,但具体改革议题选择、事项选择甚至改革政策和具体举措都要几上几下充分征求部门意见,部门不同意的改革动议往往都会流产。近几年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选定就是这样的历程,很多加强监管的文件也是部门牵头制定出来的,即便是地方政府被赋予试点改革的权力,在方案形成过程中,下级委办局也要向中央分管部委充分汇报,征得同意,这样的制度设计往往导致下一步改革的碎片化。国

家的改革方案是部委方案的汇总,当某一部委提议的改革措施在落实的时候,往往发现缺乏其他各部委相关政策的配套,而且,即便是同一部委历年下达的政策和改革举措也缺乏连贯性。于是,不少政策公布了却久久无法落地,或者落地了反而造成企业办事更加不方便。当前“放管服”改革进入深水区,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打破政府部门的条块式划分模式、地域、层级和部门限制,为政府业务流程的重组和优化提供全新的平台,要对政府部门间的、政府与社会间的关系进行重新整合,在政府与社会间构建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依靠政府机构间及政府与公私部门间的协调与整合提高行政效率,打造一个具有包容性的政府,使得提供更完备、全面、无边界的整体性治理成为可能。

(三) 从数量速度到质量效益

本届政府成立以来,国务院部门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三分之一以上,提前超额完成承诺的目标任务,工商登记前置审批精简85%,资质资格认定事项压减44%,多数省份行政审批事项减少50%~70%,同时创新和完善事中事后监管,针对群众期盼优化公共服务。这些既为企业“松了绑”、为群众“解了绊”、为市场“腾了位”,也为廉政“强了身”,极大激发了市场活力,这是总结近几年“放管服”改革时经常提及的成绩单和成效图。不难看出,在这一阶段,我们更多关注的是改了没有和改革了多少问题,下一阶段,应该重点考量改革的质和效了,正如李克强总理在讲话中提到的新兴市场主体的活跃度问题,改革的速度和数量不错,质量和效益空间依然很大,政府仍然管了很多不该管的事情,存在放权不到位、监管有缺位、服务常错位和改革红利未充分释放等一系列问题。质量和效益的要求不仅体现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更是发展理念的全面展现,涉及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方方面面,需要在各个行业的产品、各个领域的管理、各种类型的服务中注入质量和效益的理

念和要求。

（四）关于互联网+改革问题

关于互联网+改革创新的理念和制度举措,当前,正在大力推进网上审批、“互联网+政府监管”“互联网+政务服务”等各项工作。现实中最大的问题是信息不公开和数据难共享,如果政府部门间数据信息不共享、企业信息不主动提供,互联网+改革就是个伪概念。国务院要明确具体部门牵头,重点是政务而非技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电子政务服务平台,打通数据壁垒,消除信息孤岛,推动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网上办理,构建全国“政务服务一张网”。为全面、切实解决目前各自为政的“部门信息孤岛”问题提供统筹制度安排和“顶层设计”,制定电子证照、数据共享、网上身份认证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出台一系列旨在促进信息资源共享的整合措施、管理办法和实施步骤。整合构建统一的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和政务服务信息系统,充分利用已有设施资源,盘活各个部门的信息数据库资源,推动平台资源整合和多方利用,逐步推进各级共享交换平台对接,支撑政务信息资源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互通和协同共享。

五、关于全国一盘棋推进“放管服”工作的建议

从理念上说,中央政府层面“放管服”基本上就够了,缺的话再加上“法”,这里的法指的是要于法有据,更要符合法治精神和运用法制思维处理改革进程中的问题。但地方政府还要做好“领、接、改、评”,才能确保改革政策落地。“领”就是要统领,要有整体谋划,要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出台务实管用适合本地区的系统化改革方案;“接”就是要领会国家行政管理改革精神,要引领部门和社会组织接好下放或取消事项管理问题,要在人、财、物、机构、技术装备等方面予以实实在在支持;“改”就是要利用网络服务平台和实体政务办事大厅两个平台的信息技术优势和集成办公优势,做好服务流程优化、

管理机制创新和新型制度建设等改革创新工作;“评”就是要发挥绩效评估的作用,以评促改,以评促建,要考评办事审查的效率、协作协同的效能、服务监管的效果,要考察改革的力度、工作的强度和群众满意度,要看速度是否快了,收费是否少了,作风是否好了,要充分发挥职能部门、专家学者、第三方评估机构和人民群众的督查考评作用,以期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完善举措和推进改革。

国务院推进职能转变协调小组成立以来,各专题组和功能组密切配合,围绕“放管服”所遇到的普遍性的与顶层设计相关的问题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围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出现的许多跨部门不协同的难点和堵点问题进行了联合攻关,特别是在指导地方和部门推进改革创新方面搭建平台,出台了系列文件,召开了多次现场会议,为全面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和推进政府履职方式创新给予了有力指导和引领。当前一个重点是要做好“放管服”改革精神落地的推进工作,应鼓励地方成立相关职能转变领导小组等改革机构,确保相关文件在地方能够生根发芽,取得进展和实效。建议明确各地政府以推进职能转变协调小组作为主管机构,可以与各级党委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或者与政府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下设若干工作小组,统筹“放管服”工作,不一定完全对等中央政府,但设立政府监管改革小组和政务服务体系建设小组应该成为选项,协调小组办公室可以与各级审改办合二为一,也可根据研究或统筹力量设在政府办,这样的机构设置有利于上下衔接和统筹协调。各地方在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或者推进职能转变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统筹谋划一个地方的改革工作,避免以文件落实文件、不协同、难落地等问题。

六、关于“放管服”改革的一些具体建议

（一）“放”的方面

国家部委层面，囿于法制、观念、利益和能力，担心改革进程出现问题要承担责任，不积极回应“群众和地方点菜”，必须做出格局上的调整。一是企业、项目 and 个人的审批事项可否不到部委再审批，现在不少事项是省一级政府打包统一上报来批，把关效果一般，应该通过其他方式加强规划管理和科学论证；二是技术检验类许可，比如电梯，可否认证后不再审批许可，而是通过事中事后监管和标准化评估来实现管理；三是资质资格类，该动一些打着生命安全、生产安全旗号许可事项了，不少加强监管的机构，还在使用老办法设许可门槛，有些实践证明效果一般，比如医师证，保健品和药品专业人员资格证等，可否取消许可，改用其他评价方式和事中事后监管方式予以管理。

大家经常抱怨不同部门难以协同下放某一事项，实际上部门也有苦衷，毕竟同一事项的管理责任和管理内容不同，对下级部门的承接能力也是考验，但改革不应停留在某一事项审批要不要、放不放，而应研究整个行政职权体系的合理分工问题，在进一步改革中考虑相关监管职能和机构的整合问题。地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再出发再攻坚，要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力度，以清理部门规章和省级人大条例、省级政府规章为重点，切断掌控行政权力者以此寻租、与民争利的灰黑路径。在清理行政审批项目的同时，还要同步清理具有审批特性的其他权力事项和公共服务事项。

（二）“管”的方面

政府管的改革在体制、机制、法制、能力和文化等诸多方面都有寻求突破的空间。一是要构建科学的监管职责体系，完善综合监管，推进市县两级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减少多头执法和重复检查，消除监管盲点，在机构未进行大的调整前，要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制定部门监管责任清单，明确监管主体，细化职责分工，建立登记注册、行政审批、行业主

管相互衔接的监管机制，确保事有人管、责有人负。二是政府部门内部应探索审批监管服务分开，解决内部职能边界，构建决策执行监督相对分离相互制约权力运行机制，比如有些地方在推进“两集中两到位”改革时对部门内设机构进行调整，归集行政审批权，明确内部对外监管处室；三是进一步探索中央和地方监管职能和责任划分问题，要构建新型监管体系，不能回避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财权划分问题，不研究这个问题，监管永远难以制度化落地。比如环评、能评等一些中介服务事项，可否让地方承担更大责任；四是商事制度改革实现了“先照后证”，很多前置审批变为后置审批，但没“证”企业还是运行不了，还要进一步清理后置审批事项，取消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必要的后置办证事项。为企业发展创造条件。五是加快推进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建设，构建以信息归集共享为基础，以信息公示为手段的监管制度，信息归集共享机制真正建立起来、顺畅运转，事中事后监管的许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六是强化信用监管。搭建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扎实做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工作，尽快健全相关制度，将企业信用信息纳入信贷审批、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国有土地出让等工作的审批程序，整合监管资源和执法力量，推行协同监管和综合执法，建立跨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和失信惩戒机制，创新经营异常名录和“黑名单”制度，真正做到“一处失信，处处受限”。七是丰富智能监管。积极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创新和加强市场监管，鼓励开发综合监管系统，使用智能化执法终端，实现监管和执法办案的全程信息化，提高市场监管效能。整合抽查抽检、网络市场监测、违法失信、投诉举报等相关信息，加强监管风险监测研判，做到早发现、早预警。八是创新日常监管。普遍推广“双随机”抽查机制，建立市场主体名录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通过摇号等方式，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

法检查人员，确保监管执法的科学性、公正性。此外，地方政府必须要求所有基于办事人申请的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一律进驻政务服务大厅，规范审批流程，强化窗口主导，推进政务服务规范化、标准化，全程电子监察，让政府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三）“服”的方面

首先是创新服务理念。建议研究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和公民个人全生命周期服务两个问题。提高服务“双创”的效率，为企业开办、成长和推出提供“一条龙”服务。现在政府的相关改革集中在商事制度改革和投资项目报批环节，这两个环节是企业入口改革和企业投资环节问题，也就是企业发展的第一步，如何服务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和转型升级，特别是困难时期的金融和政策方面支持尤为重要，金融机构对国有和民营企业区别对待，造成很多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和许多金融领域不正常现象。此外还应研究出台企业退出机制政策制度，不仅包括问题很多的僵尸企业，还有活力不足的新办企业。另一方面，要研究与民众关系密切的就是人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问题。据调查，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需要办理400多个证件，多数证件只用一次，证件清理任务繁重，应该成为改革重点，增强民众的改革获得感。再就是民生服务问题，要区分公共服务、政府服务、社会服务等概念和范畴，对于那些不该政府管的应该换种改革思路，采用市场机制解决。要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多渠道提升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要依托“互联网+政务服务”，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更方便、更快捷。其次是优化服务方式。政务服务中心是解决政府与公众“最后一公里”或者说“最后一米”的问题，“放管服”改革必须打通这一道关，要把政务服务中心作为推进改革的抓手，加快构建统一的“一站式”服务体系，各级政府要认真落实“一个部门一个窗口对外、一级政府‘一站式’服务”的要求。

通过转变传统管理方式，优化和再造业务流程，全面梳理涉及群众办事的政务服务事项，逐项梳理基本流程和办事依据，简化无谓证明和烦琐手续，推进政务服务的协同化、便捷化和智能化，切实解决传统管理环节多、材料多、往返多等现实问题，实现政务服务事项的网上综合受理和全程协同办理，涉及政务服务事项的证件数据、相关证明信息等跨部门、跨区域、跨行业互认共享，切实做到“证件联用、信息联通、服务联动”，力促“群众跑腿”向“数据跑路”转变、“条块分割”向“整体联动”转变、“群众来回跑”向“部门协同办”转变。再次是加强对各地政务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在调研中地方一直呼吁国务院设立中央政府政务服务管理机构，根据多年调研和沟通汇报，笔者认为，现在可以在国务院信息公开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加挂政务体系建设指导办公室牌子，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政务体系建设指导办公室主要负责推进、指导、协调、监督全国政务服务改革创新和体系建设工作，负责对中央政府各部门设立服务大厅、窗口进驻、事项办理的组织协调、监督管理和指导服务，并对全国政务服务中心和网上办事大厅建设工作进行业务指导。

深化“放管服”改革是一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深刻变革，是构建现代政府治理体系的重要抓手，各级政府要树立大局意识，相忍为国、让利于民，以政府减权限权，激发市场社会新活力，创造新供给，释放新需求，培育新动能，打造高效透明低成本的政务服务体系，要以“啃硬骨头”和“自我革命”的精神，以“三严三实”狠抓落实的作风，敢于涉险滩，敢于过深水区，不断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推出更加务实有效的举措，真抓实干，狠抓落地，将“放管服”改革做深、做透、做到位，不断推向深入。

（《行政管理改革》作者张定安系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秘书长、研究员。）

为何设立国家监察委， 它有哪些监察手段



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在此召开的中共五大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是中纪委的前身。1949年10月设立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1949年11月，设立中纪委。1955年3月，又改为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文革”中被撤销。1978年12月，选举产生新的中纪委。2016年监察委员会试点启动，监察被赋予新的定义。（东方IC/图）

马怀德解读国家监察委员会

2016年11月7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下称《方案》），部署在上述三省市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

《方案》提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是建立在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要实施组织和制度创新，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扩大监察范围，丰富监察

手段，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面覆盖，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根据《方案》，试点地区的监察委员会将与纪委合署办公。

此外，2016年10月27日通过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中写道，“各级党委应当支持和保证同级人大、政府、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等对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依法进行监督”。这是中国官方首次将“监察机关”与人大、政府、司法机关一并提及。

“过去是‘一府两院’制，今后可能就是‘一府一委两院’制。之所以设立一委，就是要加强对一府两院和其他公职人员的监督。”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说。



马怀德

马怀德是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中纪委特邀监察员。《方案》出台两个半月前,他曾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刊发题为《通过修法完善国家监察体制》的文章。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马怀德表示,从多数国家在监察领域行之有效的做法来看,有几点经验可资借鉴:一是保障监察机关的独立性、权威性;二是对国家权力运行实施全面监察;三是赋予与监察机关地位和作用相匹配的多元、有效的监察手段。如果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中国监察体系面临的上述问题,都将得到改善。

“一府两院”加“一委”

南方周末:《方案》将此次改革称为“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这样的表述较为罕见,是否有什么特殊含义?

马怀德:以前中央文件中的表述多为“政治体制改革”。体制主要指机构、职能、权限以及机构之间关系的调整。此次改革是整个监察制度的重新构建,涉及面很广,关系到宪法、法律制度。

《方案》的目的就是要设立一个与国务院平行、独立于政府机构之外的监察机关,也就是国家监察委员会。我们可以称之为“一府一委两院”制度。之所以设立“一委”,就是要加强对一府两院和其他公职人员的监督。它所产生的影响,可能不亚于1998年、2003年的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从这个角度看,用“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是比较恰如其分的。

南方周末:《方案》提出,在试点省市,由省级人大产生省级监察委员会,作为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为什么要由人大产生?

马怀德:因为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所以监察委员会由人大产生、向人大报告工作并对人大负责,是符合宪法基本原则的。另外,地方各级都有人大,所以监察委员会也要在地方各级设立,不仅仅是国家一级的监察委员会。

这里还涉及改革国家监察体制的宪法依据问题。依据宪法,全国人大有权制定设立国家机构的法律,也可以做出设立国家机构的决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行使全国人大的权力,包括做出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决定。

而且近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决定的领域和范围,也已经不限于立法领域,比如《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决定》《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等。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通过授权的方式设立国家监察机关。

南方周末:《方案》为什么选择北京、山西、浙江作为试点省市?北京作为政治中心,被选为政治改革试点的先例并不多见。

马怀德:作为一种猜测,我想,把重大的政治改革试点放在首都具有一种示范作用。无论是试点的现状、基础,还是防腐建设、制度建设的保障条件,北京可能比其他地方要强。

山西是近年来的反腐重点区,十八大后反腐工作成效显著,探索出了一些工作方法。在这样的地方搞试点,也有其独特价值。

至于浙江,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发达、经济发达的东部省份,进行监察委员会试点时,在体制、机制的设立、运行、实践效果上可能遇到更多的问题,也能积累更多的经验,便于下一步向全国总结推广。

“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南方周末:《方案》强调,要“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全覆盖具体包括哪些人群?是否无一例外?

马怀德:依据现在的行政监察法,监察部门的覆盖范围只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以及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这个范围窄于公务员法。我国的公务员法很特殊,调整对象不仅仅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也包含了立法机关、

司法机关、各党派和主要人民团体的公职人员等。只要是行使公权力、由财政供养，都算广义的公务员。今后，监察委员会的监察范围会与公务员法持平，比如法院、检察院、医院、学校等都在监察之列。

南方周末：那么国企人员呢？

马怀德：现在，很多大型国企的领导由政府、国资委任命。这些由政府任命的国企人员也要接受监察。

南方周末：我们经常的新闻中看到中纪委查处违规违纪行为的报道，但媒体对监察部的作为少有提及，这是为什么？

马怀德：十八大后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加大反腐力度。监察部与中央纪委合署办公，业务部门是随着中央纪委的第一纪检监察室、第二纪检监察室这样设立的。监察部干的事，实际就是中央纪委干的事。

纪检部门也探索出一些新的反腐方式方法，对纪检体制进行了一些改革。比如巡视、全面派驻等。尤其是2015年底，中央纪委共设置47家派驻机构，实现了对139家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的纪检全覆盖，包括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政协、工青妇等人民团体。这些制度的熟练运用和发展，造成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不协调的问题。长的就是纪委系统。

而监察部囿于只是一个政府部门，囿于行政监察法赋予它的职能就是监督政府机关及其任命的工作人员，也就是说只能在政府范围内监督。这就让它变成了那条“短腿”。

这种情况下，国家监察制度必须随之调整、改变，否则就会出现很大的不协调，出现监督空白地带、出现监察力不能及的地方。我想，这是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最直接的原因，也是最重要的改变。

虽然现在纪律检查的覆盖面宽于监察，但以后监察的覆盖面会更宽。因为纪检只能管党员。无论党员还是非党员，只要是公职人员，就要接受监察委员会的有效监督。

“半垂直的领导体制”

南方周末：《方案》要求三试点地区整合资源、调整结构。具体是指哪些资源？

马怀德：目前的反腐败资源力量有哪些？政府内部的监察机关、审计机关、预防腐败部门；政府外部的人民检察院的反腐败、反渎职部门，以及检察院内部的预防腐败局。各种重要反腐职能分布在这些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中，多头负责，资源分散，而且还有重复重叠之处。

为了建立起一个“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就要把这些反腐败资源力量整合在一起。单靠协调肯定不行，要通过一个平台重新分工整合。新设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就是这样一个平台。

南方周末：整合之后，什么人来担任国家监察委员会的“一把手”？各级监察委的人事任免等，是否仍由地方管理？

马怀德：依照《方案》，党的纪检机关与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在“一把手”的称谓上，我认为应该是监察委主任，因为1949年设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就叫“主任”。

从目前的情形看，纪检体制已经发生变化，以上级纪委为主，监察业务也是这样。如果地方各级监察委与纪委都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那么在干部的考察、选聘、提名、任用上，监察委也应该以上级为主，形成一种半垂直的领导体制。

南方周末：半垂直的领导体制，会加强监察委员会的独立性。在现行制度中，监察机关的独立性能否有效保障？

马怀德：现在监察机关的人财物虽然由地方负责，监察的独立性似乎不足，也影响监察的权威性。但因为它是党的纪检机关的身份出现，所以履职时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在编制、资金、办公条件等方面应该都能保障，独立性不成问题。但对于审计、检察院反贪反渎等单纯的监察机关来说，权力行使的独立性可能就会差一些。

南方周末：国家监察委员会如何防止内部腐

败？

马怀德：对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监督，无外乎内部、外部两种途径。十八大后，中纪委提出打铁还需自身硬、防止灯下黑、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等自我监督理念，也设置了相关的内部监督机构。比如“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就是专门对内部人员进行监督。

外部监督来自人大监督、社会监督。各级人大产生监察委这个机构，任命其人员、听取其报告、对相关人员进行质询，这些都是监督的一部分。社会公众监督看似很虚，但因为来自媒体、老百姓各种方法手段的全方位、全天候监督，人民群众还可以通过举报、投诉、来信来访等传统方式监督，所以实际上比较“实”。

多种监督中，最重要的就是法律的监督。如果将行政监察法修改为《国家监察法》，通过法律明确监察委的职责、权限、运转程序、具体措施，并按照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方式进行监督，会有很好的效果。尤其对于这种权力大、涉及面广的重要部门，更需要强化法律对其职权行使的有效监管。

“在法律上受到更大约束”

南方周末：改革后，国家及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将具备哪些监察手段？

马怀德：手段方面，目前的行政监察法赋予监察机关检查权、调查权、建议权和行政处分权等。但由于有限的监察手段分散于各个部门，且偏重事后监督，所以一些方式方法在实践中难以落实。

一旦改革，监察委员会的监察手段将得到优化、丰富。除以往的监察方法外，审计、反腐反渎案件侦查等，都将集于一身。尤其对贪腐、渎职案件的刑事侦查措施，过去只能由检察院享有，纪检监察机关没有这项权力。以后，监察委也许可以使用刑事拘留、逮捕甚至监视居住等手段。

这里还涉及侦查成本问题。现在，纪委在查处违纪过程中只有党内的手段措施，虽然也能收集一

些证据，但笔录、口供等要想成为司法程序中的证据都要经过检察院的二次转化。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可能出现出问题，还可能出现变数，造成无谓功。监察委员会如果享有反贪反渎案件的侦查权，就大大减少了转化的必要性。这不仅解决了限制违法违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合法性问题，还能填补纪检机关与司法机关在衔接、协调过程中的障碍、漏洞，同时也会在法律上受到更大约束。

南方周末：未来接受监察委员会调查、侦查时，违法违纪嫌疑人的权利如何保障？监察委员会立案后，律师能否介入？

马怀德：保障嫌疑人权利、律师介入的问题，要看监察委员会设置过程中相关法律的制定和修改情况。比如将行政监察法修改并更名为《国家监察法》，同时修改刑事诉讼法。通过前者赋予监察委反贪、反渎案件刑事侦查的权力，通过后明确此类案件由监察委负责。这样既能形成授权，又能形成法律上的规范和约束，对被调查人来说也是一种保护。

此外，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审计法甚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很可能都要修改。尽管我个人认为，目前还不到修改宪法的时候，但如果仍然存在有争议或者认为法律基础不够坚实，也可以考虑修改宪法。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

南方周末：三省市的试点经验会在何时向全国推开，现在是否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

马怀德：依照司法改革及其他改革试点的惯例，一般一两年之内会有阶段性成果。建立国家监察委员会是一项很重要、很迫切的改革，我想2017年党的十九大前后可能会有一些成果出现，或者在多地推开。

在行政监察法及其他法律的修改时间上，应该也不会太久。当然，修法要与试点经验结合，修改的必须是有定论的东西，不能反复修改。所以在试点成果显现，准备向全国推行时，就是将这些经验通过修法、立法方式上升为法律制度的时候了。

（2016年11月23日《南方周末》滑璇）



林毅夫、张维迎之论需要分胜负吗

9日下午，经济学家林毅夫与张维迎在北京大学举行“产业政策思辨会”，这是两人首次针对产业政策正面交锋，被主持人黄益平称为“可能被写入历史的辩论”。这场辩论围绕着政府是否应该通过产业政策介入经济发展而展开，林毅夫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同时作用，张维迎则认为应该重视市场和“企业家精神”。

此次公开辩论，两人的观点并无多少新意，林毅夫主张“有为”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形成比较优势；而张维迎主张废除一切产业政策。两人和而不同的背后是不同经济学派的主张。

学术往往用极端的观点来清晰地表达主张，但现实经济活动并不像经济学派那样泾渭分明，往往是多种学派的混合体。虽然最后两人都没有成功说服对方，但产业政策并不需要一个非此即彼的结论，而是对两者进行很好的调和，以更好指导我国产业政策。

事实上，站在“有效市场”的角度看，二者并没有本质上的分歧。林毅夫主张产业政策，并不排斥市场；张维迎奉行自由市场的理念，但也非无政府主义。就在当下，即便是自诩为高度自由市场的美国也充斥着大量的产业政策，今年7月，美国政府首次以白宫的名义发布了最新的电动汽车产业政策。而日本、德国等世界发达国家的产业政策也是俯身可拾。

窃以为，此次辩论会不仅林毅夫和张维迎没有辩出结果，其中任何一方的观点也未必能得到围观者的全部认同。但如何以市场机制，让政府在产业政策中实现林毅夫更加“有为”，减少张维迎认为会导致产能过剩等忧虑，恐怕对当前我国产业乃至经济发展更有裨益。

“有为”政府的产业政策，应该以市场手段弥

补市场缺陷。从经济学原理看，即便是矫正“市场失灵”最好的举措，仍然是政府通过一系列的公共政策设计，以市场的思维和手段来进行弥补，而不是直接采取鼓励或限制——政府的直接干预必然会出现张维迎所说的资源配置扭曲。而美国更是“强化市场型产业政策”的典范，其产业政策更多是作为市场缺陷的一种补救性措施。

同时，立法以加强产业政策规范也是必不可少的。张维迎认为产业政策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以及容易导致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这些都可以通过立法来限制产业政策的随意性，避免政府行政行为的盲目性，也可以通过广泛博弈的立法程序避免产业政策落入“计划经济”窠臼。

林毅夫说，“发达国家的产业政策也经常失败，因为支持基础资源，成功的概率就非常低，这是因为它的技术特性。”笔者并不赞同，这恰恰是产业政策最应该强化供给的地方，技术开发等基础资源是产业发展所依赖的公共品。“有为”政府的产业政策，应该侧重对产业发展所亟须的“公共品”供给进行。

应该看到，无论是实现比较优势还是规模经济，甚至是产业政策的初衷，仅仅靠直接补贴企业是不可持续的，只有提升产业内企业的竞争力才是根本出路。美国凭借对扶持技术研发等产业政策，使其战略性产业始终处于全球领先，而我国产业政策在规模等低层次扶持，无法使得产业真正壮大。

就此，林毅夫和张维迎的产业辩论会不在于说服对方，更不是为了一争高下，而是透过辩论反思并优化我国产业政策，让产业政策为我国产业强筋健体，这恐怕才是真正意义之所在。

（新京报 2016.11.11 作者：盘和林）



领导干部要有“大情商”

有人提出这样一个公式：成功=20%的智商+80%的情商。这个说法未必科学，但情商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用好情商的力量，是履职尽责的题中应有之义。

情商有大小之分，是独善其身还是兼济天下，考验着党性与境界。现实中，一些领导干部的“小情商”现象屡见不鲜。有的为了显示“亲和力”，什么政策口子都敢开，什么要求都给满足，虽然在一部分人那里“口碑”有了，但原则和公平却受损了。有的想问题办事情，眼光总是囿于眼前的“一亩三分地”，精于经营小圈子，尽管以按下局部的葫芦赚取了一点“威信”，却常常浮起了全局问题的瓢。凡此种种，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把自己的形象看得太重，而把群众和整体的利益看得太轻。

相对而言，“大情商”是以大多数人的喜乐为自己的行为取向，以赢得大多数人的“人缘”为衡量标准，时刻注意把个人行为聚焦在大多数人的满意度上。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无论是带领班子，还是直面群众，都不能缺乏“大情商”的政治品质。

前不久热映的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周恩来同志的大情商。在经济困难、饥荒严重的情况下，周恩来没有给自己所视察的那个革命老区来个“近水楼台先得月”，也没有顾及少数干部的面子，而是想到了广大人民群众，考虑的是如何共克时艰。大公无私，至真至诚，使得周恩来的形象更加高大、精神更加感人至深。

领导干部的情商，直接影响自身素质和领导艺术。“情”为工作方法之基，工作方法为“情”之

表，只有以大情商作为支撑的领导艺术，才具有强大生命力和良好社会效果。当前，改革处在深水区，各种利益关系交织在一起，如果以“小情商”的方式来处理问题，耍小聪明、玩小心思，不仅自损形象、失去公信，而且会酿成大错。因此，领导干部须以大视野、高视角定位自己的情商，不断提升领导能力。

领导干部的大情商素养，主要表现在道德品行、处事方法、工作作风、待人接物等方面，本质是一个群众观念的问题。“大情商”的品质，首先意味着把人民群众的疾苦冷暖时刻放在心上，做事始终从人民群众的角度出发、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离开了这个基础，即使再塑魅力，也不能为群众服好务。另一方面，也应时刻触摸群众的情感，知道群众喜欢什么、反对什么、支持什么、要求什么，始终和群众心连心，在良性互动中引导和感召群众。此外，还需着力提升攻坚克难的专业能力、启人心智的思辨能力、培植怡人情怀的幽默才能、讲求生动活泼的表达技巧，把哲趣、情趣和理趣融为一体，使干部在群众眼里鲜活起来、生动起来。

大功无碑，大道无形。领导干部的形象与声誉，终究要靠本事说话、用实绩服众。历史上有多少“以天下为己任”的大情商者，虽无后裔、也无碑铭，却永远被人们传颂着。而那些精心谋私、善于表演的人，虽然也博得了一时虚名，终不能久远，难免湮没于荒草之中。这不是历史老人导演的剧目，而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更是人心的选择。

（《人民日报》）

苏东坡与王安石的“半山”之谈

[摘要]东坡称赞王安石的“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二句有《楚辞》句法，王安石欣然认可。王安石问东坡，他的雪诗中“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二句是否用了道藏中的典故，东坡笑以颌之。

南京城东有一个“半山园”，是北宋王安石的故



南京大学教授 莫砺锋

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1076）第二次罢相后回到南京，筑室于此。因位于从钟山到城门的半途，故取名为“半山园”。到了元丰七年（1084）

七月，刚离开黄州贬所的苏东坡路经南京，来到半山园拜访大病初愈的王安石。身穿布衣的东坡说：“轼今日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笑着说：“礼岂为我辈设哉！”

苏东坡与王安石，一个是因反对新法而经历了四年磨难的旧党中坚，一个是业已退出政坛的新党首领，两人不但分属两个政治营垒，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个人恩怨。东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东坡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说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尽管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但是东坡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王安石则把东

坡视为隐然的强敌，必欲把他驱逐出朝廷而后快。当然，王安石对东坡的才学其实是深为赏识的，当东坡遭遇乌台诗案后，王安石从南京上书神宗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对东坡得以免死出狱起了很大的作用。

时光会冲淡人们心中的怨恨，在半山园里相对而坐的苏、王二人虽然都还坚持着各自的政治立场，但毕竟远离了政治漩涡，彼此间的敌意已大为减退。坐定之后，东坡说他有话想说。王安石顿时变了脸色，以为东坡要重提旧怨。东坡又说，他要说的是有关天下的大事，王安石才定下神来倾听。于是东坡对当前朝廷接连用兵和屡兴大狱的措施表示不满，认为“大兵大狱”是汉、唐灭亡的前兆，并劝王安石出面阻止。王安石说那都是吕惠卿主政的结果，自己已不在位，不便干预。东坡又说：“‘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这只是事君的常礼，而皇上待你以非常之礼，你岂能以常礼来报答皇上？”王安石顿时激动起来，厉声说：“我一定要说！”但他马上叮嘱东坡不可泄漏此话，原来他对吕惠卿的倾轧心有余悸。

此时东坡与王安石身上的政治家色彩已经消退，文人学士的身份意识得以凸显，他们的对话很快离开了政治的主题。两人互相出示自己的诗文，东坡手书近作相赠，王安石意犹未尽，就自诵其诗，请东坡书写后留给自己作纪念。东坡称赞王安石的“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二句有《楚辞》句法，王安石欣然认可。王安石问东坡，他的雪诗中“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二句是否用了道藏中的典故，东坡笑以颌之。东坡在江宁停留数日，两人多次作诗唱和，东坡游蒋山的诗中有“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二句，王安石大为叹赏，当即和之，并叹息说：“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二句！”王安石甚至劝

蒋介石也曾在美国大选中“押错宝”



1948年，北平城中支持杜威的游行

今年美国大选期间，有许多国家的领导人被指“押错宝”不看好川普（甚至公开批评川普）。故此，蒋介石在1948年美国大选期间“押错宝”的故事，被很多媒体、学者及新闻节目重新翻出，大致谓：1948年，蒋命陈立夫携巨款赴美，资助与杜鲁门竞选总统之位的共和党人杜威，以求他在当选后能为国民政府提供美援。杜鲁门成功连任后，对蒋介石支持对手的行为十分恼怒，不久发表白皮书，宣示放弃援蒋。此外还有人称，杜鲁门拒绝接见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①

揆诸史料，除蒋介石支持杜威确有其事之外，其余“押宝说”、“贿赂说”、“报复说”，均缺少切实依据。

杜威的政治立场符合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利益，而杜鲁门与蒋矛盾重重，蒋支持杜威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是“押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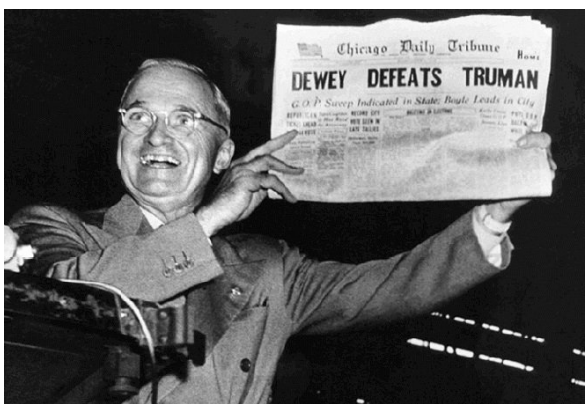
1948年，蒋介石与杜鲁门之间，已矛盾重重。其选择支持杜威，并非“押宝”，而是认为后者的政见更符合自己 and 国民政府的利益。首先，在对华政策上，杜威“指责美政府与苏联订立雅尔达秘密协定，致使苏联得以霸占东北与华北”，且在面对苏联扩张时无动于衷。杜威指控说，当苏联稳步前进，“我们自己的政府迄今为止似乎已对我们提供自由机会的制度失去了信心”“共产主义者及其同路人已在我们政府里担任起重要职务”。^②杜威进而主张加大对国民政府的援助，以对抗苏联在东亚的扩张。援华是杜威一以贯之的外交主张，并不是因蒋介石支持其竞选，才提出来的。

其次，当时美国民主党分裂，党内左翼领袖华莱士组建进步党，右翼势力则组成迪克西民主党，分别参选。美国国内民调几乎一致显示，杜威占有绝对优势，将赢得选举。《芝加哥论坛报》还预先付印了“杜威击败杜鲁门”的头条新闻。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于公于私，蒋介石不支持杜鲁门而支持杜威，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中国国内的观察者也大都相信，杜威在选举中更有胜算。如费孝通当年撰文分析，“杜威是个劲敌，在上一次大选时，他和罗斯福还坚强较量过。如果民主党推不出一个有力的候选人出来，换一句话，如果杜鲁门出面和杜威竞选，那很可以说是‘认输’的姿态”。不待选举结果出炉，费孝通即已开始文章中分析杜威上台后，美国可能会采取的对华政策。^③

东坡卜宅钟山，与他结邻而居，所以东坡在赠诗中说：“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一个月以后，东坡渡江北上，王安石送走东坡后，对人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劫波度尽，恩怨尽泯，

两位文化巨人终于消除了彼此间的敌意。王安石最终改正了对东坡的看法，而东坡更是以不计前嫌的态度对待王安石，东坡的胸怀有如光风霁月，令人敬佩。（扬子晚报[微博]莫砺锋 2016-11-24 文）



杜鲁门获胜后，手拿头条为“杜威击败杜鲁门”的《芝加哥论坛报》

蒋介石提供竞选资金“贿赂”杜威的说法，是坊间传言，没有史料能够证实

杜威团队本身既不缺钱，又较少花钱，没必要接受外国政治献金使自己染上污点

杜威有美国企业家为后盾，并不缺少竞选资金，以至杜鲁门在对民众演说时，会攻击杜威和共和党，“华尔街希望用它的钱去选举一个会首先倾听贪婪的特权者，而根本不是人民的共和党政府”。杜威的竞选团队当时急欲取消其作为“华尔街纨绔子弟”的形象。

此外，杜威在竞选中相当低调，并没有大力开展活动。据接近杜威的人说，留有八字胡须的杜威“看上去像一个恶魔”，他的演说“枯燥乏味”。更让人惊奇的是，因为担心会被感染细菌，杜威极为厌恶同人握手，这无疑使他失去了和选民亲密接触的可能。^④这样一来，杜威竞选所需资金也就相对有限，不存在向外国寻求政治献金的动机。

相比之下，杜鲁门采取积极的竞选策略，在全美开展巡回演说，以总统身份和美国民众直接对话。统计显示，他在竞选期间的总行程超过3万英里，在大大小小的火车站发表了356篇演说，听众达到1200万人。^⑤显然，杜鲁门比杜威更“烧钱”。

陈立夫为杜威带去巨款之说，迄今仍停留在坊间传闻的程度，而无史料可以证实

1948年6月，蒋介石命陈立夫赴美，为杜威提供巨额竞选资金的说法，在当年即已流传颇广。1948

年11月4日，美国大选刚刚落幕，印尼的“进步爱国侨报《生活报》”即发表社论《杜鲁门竞选胜利的意义》，“全世界的战争贩子，对于杜鲁门续任总统自然会感到失望的。陈立夫献美金一百五十万美元以支持杜威竞选，结果落了个空。蒋总统的最后两张王牌：一、杜威当选美总统；二、世界大战，如今都落空了”。^⑥

但迄今为止，关于陈立夫奉命携款“贿赂”美国总统候选人一事，仍停留在坊间传闻的程度，而无史料可以证实。且以常理论，杜威当日身处全美聚光灯下，且民间已有此类传言，若传言为真，杜鲁门和民主党没有理由不就此大做文章。美国媒体也不会对这种接受外国政治献金的违法行为坐视不加报道。而事实上，杜威竞选期间，民主党没有拿此丑闻攻讦他；竞选失败后，杜威在纽约州州长任上从政多年，其政敌也未以此事追究其法律责任。

陈立夫回忆录《成败之鉴》中有三节说到自己1948年的美国之行。他说自己的任务乃是“考察民主政治之施行经过”，“见过美国总统杜鲁门及该国政府中许多重要人物，及两党领袖”，“到美国拜会了国防部部长、财政部部长以及其他重要首长”。这里所谓“两党领袖”中应包括共和党领袖杜威，但陈立夫未详写与其会面的具体情形。

可以确认的是：陈立夫此行确同美国大选有关，他为杜威带去的是蒋介石的一封私人信件。陈立夫回国后，在采访中乐观表示：“杜威之当选总统几系一定不移者”“如果杜威当选，对于以军事援助中国，将采取一种非常之办法”。^⑦



1951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和纽约州长杜威在一起

杜鲁门连任后发表白皮书,是其对华政策的延续,不是对蒋介石的“报复”

早在选举开始之前,杜鲁门政府已在研究如何从中国“脱身”,其政策立场与蒋介石支持杜威无关

对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杜鲁门早有成见,从未积极援助。1946年,马歇尔调停期间,杜鲁门政府先是强令国民政府在东北停战,随即又对国民政府实施武器禁运,并为经济援助附加经济条件——必须先行改革,才能获得援助。迟至1948年初,杜鲁门政府才通过援华法案,同意给国民政府5.7亿美元经济援助。6月,国会通过了对华2.75亿美元的拨款(其中购置军火的1.25亿美元特别赠款,到1949年4月也未能全部支付)。

1948年后半年,也即大选结束前几个月,杜鲁门政府已认定国民政府在大陆的溃败无可避免,开始着手研究如何从中国“脱身”。7月起,美国政府内部对国民政府垮台后的善后情况进行讨论;9月,以乔治·凯南为首的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室,提出一份文件,要求重新审视对华政策,认为“继续仅仅对蒋介石承担义务……不是一种好的外交。它把美国政府绑在了一条道上,使之没有别的选择……在现时中国的形势下,潮流是反对我们的,我们需要改变航向的自由,或者甚至抛锚停泊,直到我们找到正确的航向”。⑧凯南的意见后来成为杜鲁门政府推行对华外交的重要依据。

1949年8月,《中美关系白皮书》发表,杜鲁门政府将国民政府在中国的失败,完全归结于其本身的“腐败无能”。该白皮书被认为是杜鲁门政府为自身失败的对华政策开脱的精心之作。

杜鲁门连任后,依旧接见了访美的宋美龄;蒋介石也继续同杜威保持友好往来

为渲染蒋介石“押错宝”带来的后果,某些著作声称:“1948年12月,蒋介石派宋美龄赴美求援……美国政府不将其视为官方客人,杜鲁门则干脆拒绝与她见面”。事实上,宋美龄此次访美虽受冷遇,但依旧在白宫见到了刚刚成功连任的杜鲁门。《顾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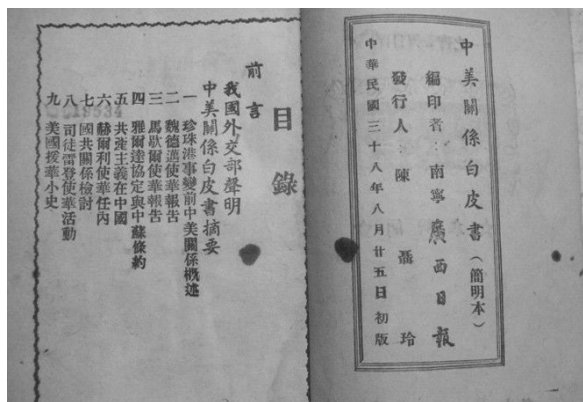
钧回忆录》中记下来当时的情况,“下午五点半开始用茶点,杜鲁门小姐斟茶,总统及总统夫人接待了蒋夫人和马歇尔夫人……五点半,总统把蒋夫人领到他的书房里去会谈”。

此时,蒋介石已不对美国援助抱以希望,一再要求宋美龄结束访问回国。蒋电报说,“吾爱见杜鲁门总统以后,无论结果如何,请吾爱速即回国,不可稍有耽擱……在未归国以前,万勿发表任何言论,以妹赴美事,与其当局说明中国剿共形势而已,说明后别无其他希望,故自应立即回国,更不宜于此时出席国会,以保留其对吾爱慕之思为要”。⑨显然,对于杜鲁门政府将延续其既往的对华政策,蒋介石极为清楚,知道多求无益。

退往台湾后,蒋介石与竞选失败的杜威也仍保持着互动。如1950年12月,杜威要求美国政府给予台湾军援,并运用海、空军,掩护台湾方面的军事行动;1951年7月,杜威访问台湾,和蒋介石“交换有关远东问题之意见”;1954年8月,蒋介石又指示在美的顾维钧代访杜威。⑩显然,杜鲁门连任成功后,蒋也并不同意与杜威继续保持密切的往来。

综上。简言之,1、蒋介石和杜鲁门本就矛盾重重,蒋支持杜威并非“押宝”;2、杜鲁门连任前后对华政策连贯,不存在“报复”蒋介石的问题;3、陈立夫赴美为杜威送去巨额政治献金等传言,没有史料依据。“押宝”说逻辑混乱,不是历史本相。

民国时出版的中文《中美关系白皮书》



(腾讯评论短史记 2016-11-23 第 570 期)